

清代乾隆年間江蘇清口地區河道工程 與地貌變化——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河工輿圖爲中心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摘 要

黃河因其易徙、易決、易遷的特性，是以治理黃河向來為中國歷朝政府的重大政務之一。明清時期依賴運河輸送江浙漕米到北方，但運河位於江蘇淮安清口一地，適因與黃河交會，當地漕糧運輸深受黃河影響，河水泛濫倒灌的結果，將造成運道受阻，是以黃河處處制約著運河物資運輸的順暢。康熙初年河道總督楊方興曾指出：「治河即所以治漕。」由此可知，政府治河，一方面是抗災防洪，維護地方經濟；其重要目的更是為了保障國家財賦供應的穩定，這正是清代河工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堵口，修防的關鍵所在。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代軍機處檔案中，收藏著河道官員在治河過程上所製作的工程圖繪，其中尤以十八世紀乾隆年間數量也最為豐富，提供今人研究當時中央與地方的治河決策、以及分析河道地貌的歷史變化。本文即以其中十幅有關江蘇清口黃淮交會治河工程為線索，藉由工程圖的繪製時間、官員奏摺與皇帝諭旨內容的解讀，分別討論江蘇淮安清口一帶運河、淮河與黃河的修建經緯、決策形成原因以及河道地貌變遷的關係。

關鍵詞：乾隆年間、江蘇、淮安、清口、清黃交會、軍機處檔、河工圖

一、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軍機處檔奏摺抄件之中，含有相當豐富的附圖資料。這些珍貴附圖資料的產生，主要是地方官員在奏報處理事務過程上，文字內容往往不能充分表達事件原委與實際情況，因此，經由繪圖貼說方式，透過圖像形式，藉以加強文字敘述內容，也提高君主閱覽奏章後作出批示的正確性。事實上，在許多硃批或上諭等資料裡，君主也嚴格要求官員奏報類似事件時必須具圖呈覽。因此，透過對附圖的深入分析與解讀，對深化清代歷史研究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

軍機處檔案奏摺附圖依其內容可歸納為：農具圖式、邊防地圖、界址圖、建築圖樣、巡幸道里圖、行政區域圖、裝潢圖、地方城垣圖、採礦圖、戰爭態勢圖、軍制服飾圖、河道圖、水利工程圖等，其數量約共三三〇餘幅。其中，河道與河工有關輿圖即佔二一五件，佔軍機處檔案附圖中三分之二以上。這些資料，不僅反映清代政府對治水的高度重視，而輿圖本身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而言，也提供藝術鑒賞與水利研究的重要素材。

這些河工圖依其所在位置又可進一步區分成：

- 一、直隸地區的永定河、大清河、以及山東省運河堤岸圖等共計五十六幅；
- 二、黃河中游河南省所轄沿河州縣河道工程圖共五十二件；
- 三、江蘇省地區包括徐州府一帶的黃河工程圖、淮安府高家堰地區、清黃交匯堤壩工程圖、以及揚州府所屬下河工程圖等，計六十七幅；
- 四、浙江省錢塘江南北兩岸修築海塘圖十五幅；
- 五、長江流域堤堰修建情形圖十八幅；以及
- 六、其他部分，如清帝皇陵以及邊區州縣河道修築圖共七幅。¹

從這些軍機處檔案河工輿圖數量比例中可以清楚看到，清代治河核心，主要集中在北方永定河、山東運河、浙江錢塘江，黃河中遊河南及其下游淮揚等區域。其中，又以黃河下游江蘇省淮安府清口地區，因其位置正處於黃河、淮河、運河三條河道交匯之處，是以清代政府不惜投下大量人力物資，大肆修堤築壩，甚至皇帝六度御駕親臨，指示修防政策，無不是為求鞏固河道暢通，保障地方民生的理念。

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河工圖數量的初步統計，參見鄭永昌，〈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簡介〉，《故宮文物月刊》，348期（2012.3），頁5。

《清史稿》〈河渠志〉曾指出：

夫黃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運亦病。由是治河、導淮、濟運三策，群萃於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鉅，人民田廬之頻歲受災，未有甚於此者。²

明清定都北京，國家稅賦大半仰賴江南，其每年上供漕糧四百餘萬石，必須藉由京杭運河運輸北方。因此，運道暢通與否，直接關係著朝廷歲供與國家財政命脈。然而，自金世宗（1161-1189）大定年間黃河奪淮南徙以後，江南漕糧即長期飽受黃河洪流的威脅。³ 國家歲賦的穩定、江南民生經濟的保障，遂成為明清時期政府必須面對，卻又難以克服的難題。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軍機處江蘇地區的河工圖，其中有十餘幅奏摺附圖，即是清代政府整治淮安清口地區所繪製的工程圖。本文將選取【表一】所見十幅作深入討論。這些工程圖繪製時間，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年間（1736-1795）。透過這些河工圖的解讀，不僅可以深入了解清代乾隆時期治河、導淮、濟運所作的努力；而隨著地方堤岸壩閘的逐步修建，既為淮安清口地區確立起完善的修防制度，另方面也反映在地貌空間上，隨著國家工程的展開，呈現出百年間不同的變遷歷程。

表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淮安清口地區河工圖清單

| | 品 名 | 時 間 | 文獻編號 |
|----|-------------------------|-------------|--------|
| 圖一 | 雍正十三年：黃河清口木龍圖 |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 005027 |
| 圖二 | 乾隆十三年：黃河清口木龍圖 | 同上 | 同上 |
| 圖三 | 乾隆十四年：黃河清口木龍圖 | 同上 | 同上 |
| 圖四 | 移建清口東西壩疏治通湖引河並開挖陶莊迤北引河圖 |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 020032 |

- 2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河渠志》(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1)，卷127，〈河渠志二·運河〉，頁3770。
- 3 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治河》(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1998)，頁66；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6)，頁16。
- 4 清道光年間曾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麟慶(1791-1846)即說：「治河難，治河而兼治漕則尤難。」由此可見黃河奪淮以後，位處黃、淮、運三河交匯處的清口地區，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見(清)麟慶輯，《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清道光二十一年雲蔭堂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輯9，冊6，頁1-19)，不分卷，「河口圖說序」。

| | 品 名 | 時 間 | 文獻編號 |
|----|--------------------|--------------|--------|
| 圖五 | 擬改楊家莊運口圖 | 乾隆四十三年 | 019909 |
| 圖六 | 清口新西壩遮下新築束水堤工圖 |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 022971 |
| 圖七 | 陶莊新河估挑展寬圖 |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 026369 |
| 圖八 | 陶莊新河形勢圖 |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 040792 |
| 圖九 | 外河廳屬開放沈家窑引河溜勢通暢情形圖 |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 | 030984 |
| 圖十 | 陶莊新河現在情形圖 |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 026180 |

江蘇淮安府清口，位處洪澤湖北部湖水出口地方，適與黃河下游東注入海河道相交，在當時稱為「黃清交匯」之地。⁵ 該區引河縱橫、閘壩林立，堤岸交錯。其中如高家堰工程、裡運河的運口、清口東西壩、陶莊引河的修建、木龍挑水壩的設置、外河楊家莊運口等重要工程，在軍機處檔案附圖中皆一一清楚可見。

然而，個別圖像只是一幅特定時間所留下的紀錄，也僅是一個靜止空間的呈現。因此，如能將主題相關的輿圖，並結合歷史文獻資料，作綜合且時序性的考察與探討，對於解讀輿圖本身產生的歷史背景、地理空間變化、以及國家治水政策的推行過程，將可清晰地勾勒出更為具體的歷史面貌。⁶ 以往有關清代整治淮安清口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文獻史料方面探討，相對地缺乏圖像資料的輔助，大多也偏向於政治面或輿地學的論述⁷；晚近以來，隨著歷史地理學與輿圖學領域的長足發展，

5 清口，在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南，古泗水出口，本名泗口，亦稱清河口。黃河奪泗入淮後，即為黃淮交匯之處。淮河到此，大部流入黃河歸海，小部流入蘇北運河。隨著洪澤湖湖面的擴大，淮河與湖相合，清口遂成為洪澤湖的出口。(清)張希良《河防志》所言：「清口者，運河入黃之口，即淮水所從出之口也。」轉引自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頁198。

6 輿圖學專家李孝聰教授即曾指出：「對於古代河工水利輿圖的運用，不能僅憑對某一幅地圖的解釋，而是需要盡可能多地選擇具有相同主題、相近的覆蓋空間，不同時代繪製的輿圖來審讀，通過圖面內容的對比，來發現河流的變遷，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歷次水利工程的情況。同時，注意與文字史料的結合并重，一定要能夠結合清代檔案來閱讀研究。單憑閱覽輿圖本身來研究是不夠的。」詳參李孝聰，〈黃淮運的河工輿圖及其科學價值〉，《水利學報》，39卷8期(2008.8)，頁953。

7 以往討論清代整治黃河下游問題在相關河工研究史中均有涉及，茲列舉其中具代表性者，如：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中州學刊》，2003年3期，頁97-100；張勉治著，唐博譯，〈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清史譯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6)，頁6-60；張衛東，〈黃淮交匯時期的清口〉，收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編，《歷史的探索與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6)，頁117-125；季祥猛、范成泰、朱興華、戴甫青，〈古清口的興盛與變遷〉，《中國水利》，2008年8期，頁60-63；袁飛、馬彩霞、朱光耀，〈小議康乾時期治河活動中的利益衝突〉，《安徽農業大學學報》，17卷6期(2008)，頁127-129；李倩、程杰、徐業龍，〈大運河淮安段的修築及其演進〉，《淮陰工學院學報》，19卷4期(2010)，頁1-9。

透過輿圖與文獻資料相結合，開拓相關研究的嶄新視野，對筆者本文研究提供相當助益。⁸

本文即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試圖利用院藏軍機處檔案有關清口一帶河道工程圖，結合奏摺檔案、官方文獻、方志文集等史料，深入討論乾隆時期清口周邊水利工程建設，包括裡運河運口的修建、清口東西壩的管理、陶莊引河的挑挖、木龍挑水壩的設置等課題，從中了解乾隆朝整治黃河下游江蘇地區辛苦耕耘的歷程。滄海桑田，當今天這些工程閘壩隨著黃河河道遷移多已隱沒，透過清代乾隆年間一幅幅河工輿圖的研究與考察，也許可以重新發掘這些已成歷史的遺址所在位置。

二、裡運河運口的整治——惠濟、通濟、福興三閘的修建

院藏軍機處檔有關清口地區河工輿圖中，文獻編號 005027，是來自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初一日由江南河道總督高斌（1692-1755），向乾隆皇帝具奏清口一帶架設木龍挑水壩後，洪澤湖西岸逐漸出現淤灘情況的奏摺。⁹ 原奏摺內附圖三幅，題名為〈黃河清口木龍圖〉，圖中上南下北，左東右西，黃河河道以橘黃色描繪，洪澤湖湖水則以青綠色表示，並標記著當地各工程位置所在與名稱。其中【圖一】繪製著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皇帝登基前夕的情況，其餘【圖二】、【圖三】兩幅，則分別繪製乾隆十三（1748）、十四（1749）兩年清口西壩淤灘的地貌變遷。除此之外，圖中另可看到雍正晚期至乾隆初年裡運河三閘壩修建的具體變化。配合地圖，本節將首先討論此三閘壩的興建經過。至於木龍架設情況，將於後文再作討論。

裡運河位於洪澤湖東北，是淮揚運河主要航道。每年南北往返之漕糧船隻，皆經由運河口（運口）出洪澤湖，轉北過清口後，隨進入黃河航道，最為艱險。至康熙年間靳輔（1633-1692）開中運河後，漕船駛出清口後，只須經過小段黃河航

8 除李孝聰，〈黃淮運的河工輿圖及其科學價值〉一文外，可參席東會，〈讀圖時代與水利國家——河渠水利圖與康熙朝河政〉，收入《『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變遷』研究生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9），頁 624-634；席東會，〈歐洲所藏清代《南河圖》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 年 7 期，頁 118-126；席東會，〈高斌『南河圖說』與乾隆首次南巡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7 卷 2 輯（2012），頁 132-142。

9 見《軍機處檔奏摺錄副》，第 005027 號，乾隆 14 年 10 月初 1 日，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摺錄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道，即可由中運河口轉入運河，航道便捷安穩。¹⁰ 然而，此時清口地區黃清交會之處經常面臨的嚴重問題是，每當黃河盛漲，淮弱黃強，黃河倒灌運口，不僅阻礙漕船進出，且黃水挾帶大量泥沙，運口與運道遭泥沙淤積。麟慶在《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一文中即指出：

嘉靖初年以後，黃常入泗，三義口淤塞，河流南徙於清河縣前，與淮水交會於小清口（即清口）。黃強淮弱，橫截河口，於是淤湖淤運，百病叢出。¹¹

為了克服黃河盛漲倒灌入運的問題，明代以來即採用挑引河，設閘壩方式，藉此調節運河水位，便利漕運；更重要是當黃河高漲時，隨即將閘門放下，堵阻黃水內灌。¹² 高斌奏摺附圖中雍正十三年〈黃河清口木龍圖〉左方有惠濟閘一處，就是明代所修建。¹³ 再比對乾隆十三、十四兩年附圖，將可發現圖中多繪出通濟、福興兩閘，也透露出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開始著手對裡運河的整治與管理。茲先將三口閘壩之建置規格表列如下：

| 閘名 | | 最新修建年代 | 閘牆（長） | 金門（寬） | 高度 | 用石 |
|-------|----|--------|--------|-------|--------|------|
| 惠濟閘 | 正閘 | 雍正十年修 | 二十九丈 | 二丈四尺 | 二丈七尺 | 二十三層 |
| | 越閘 | 乾隆八年修 | 二十四丈四尺 | 二丈二尺 | 三丈一尺二寸 | 三十六層 |
| 通濟正越閘 | | 乾隆二年建 | 三十丈四尺 | 二丈二尺 | 三丈一尺二寸 | 二十六層 |
| 福興正越閘 | | 乾隆二年建 | 三十丈四尺 | 二丈二尺 | 三丈一尺二寸 | 二十六層 |

資料來源：（清）佚名，《黃河工程圖》，清乾隆年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初河政，雖然經歷康熙、雍正兩帝的努力而逐漸穩定，但對淮安清口地區而

10（清）衛哲治修，《淮安府志》（乾隆十三年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史部·地理類」，冊700，1995），卷6，〈河防〉，頁79b。

11（清）麟慶，《黃運河口古今圖說》，〈前明嘉靖年河口圖說〉。

12 有關明清之際淮揚運河管理與閘壩建設的紀錄，參見（清）載齡等修纂，《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41，頁1a-3b，〈淮安運河考〉；另可參閱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1989），下冊，頁18-21、158-165；以及張衛東，〈黃淮交匯時期的清口〉，頁121-123等文。

13 據《清河縣志》載：「惠濟正閘，原名新莊閘，又名天妃閘，舊在惠濟祠後。明永樂中陳瑄建。嘉靖中改移於南，名通濟。萬曆六年潘季馴又移甘羅城東（此誤，應為『甘羅城南』）。康熙十九年又移爛泥淺之上，即七里舊閘，而改名惠濟。四十年復移建於舊運口之頭草壩，雍正十年移建七里溝，即今處。」見（清）胡裕燕修，《清河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華中地方·江蘇省，第465號），卷6，頁9b。

言，清弱黃強問題始終未能作有效的根治。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份來自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的奏摺，揭開了乾隆皇帝登基伊始對淮揚運河改革的契機。而當時身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高斌，正須擔當起這份重責大任。常祿摺中所稱：

伏查江南淮揚二郡運河，自清口至瓜洲，綿長三百餘里。上關漕運，下濟民田。……臣奉命巡視南漕，親履河堤，見與淮安府城牆相將，而下瞰倉庫民居、田地廡宇，皆如釜底。危堤一線，壁立其中，以為障隔，勢甚險迫。……自數十年來，運河不復挑濬，每遇清水微弱，不能敵黃，黃水渾濁，灌入運河，泥沙淤墊，日甚一日，以致運河之底漸高，水面因之亦高。……今因水高而增堤使高，何不因河高而濬水使深？……從前每歲專恃築堤束水，敷衍目前，而不為久遠利害之計，殊非治水良法。¹⁴

常祿的意見非常具體，他根據淮揚地方的觀察所得，反對河道官員年復一年的修堤而罔顧河道淤積的問題。他主張地方應動員挑濬淤沙，使河道深通，才是解決淮揚水患根本之道。

常祿奏摺經乾隆皇帝閱覽後批示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討論。王大臣等人則建議將常祿所見是否可行之處，抄發九卿及通曉河務之在京職官員討論外，同時也指示江蘇地方督撫、河臣與漕臣分別商議回奏。高斌身任河道總督，統轄江蘇各地河湖水利權責，經過他多日來的勘察，在給予乾隆皇帝覆議中，竟提出了一個有關淮揚運河重大整治的工程計畫，據其奏稱：

伏查運道河底既高，自應議及挑浚。第洪湖（洪澤湖）水高，運河水下，形勢迥然不同。今若但議浚河而不關攔運河，則河底雖深，河身縱有容納之量，水面仍無減退之形，仍不足以保堤岸而護城邑。奴才愚見，欲使運河無險患，當先使運口有關鎖，運口之關鎖既緊，則啟閉之人力可施，而洪湖之異漲可禦。運口之關鎖，係開壩是也。查現在運口內止有草壩三座，及天妃、越河石閘各一座。今若關攔水勢，議於天妃正、越兩閘之下，相去百餘丈，各建草壩三座，草壩之下，酌量遠近，再建正石閘二座，越河石閘二座，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三座。如此重重關鎖，層

14 (清)佚名編，《南河成案》，收入李莉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3，〈敬陳淮揚一帶運河大興挑挖原奏〉，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頁19a-22a。

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操縱自人，洪湖之異漲可禦，運河之水勢可減矣！¹⁵

高斌所提出的運河整治計劃，估計需銀五十餘萬兩，而為了不妨礙漕運的考量下，工期儘量壓縮在半年內完成。這個計畫重點，是利用增建閘壩方式，層層關鎖，在湖水盛漲，或黃水洶湧之際，即可堵閉閘壩以防大水倒灌入運，淤塞運道；而其中更重要的是，透過人工調節與控制水量，秉持洪澤湖水量原訂「三分濟運，七分刷黃」方針，避免洪澤湖水過多旁洩入運，又可使湖水集中，經由清口全力敵黃，這正是晚明潘季馴以來強調「束水攻沙」的方案。高斌的建議遂在總理事務王大臣支持下付諸實行。¹⁶ 在高斌奏摺附圖中，即可清楚看到三閘修建的明確位置。

除修建三閘之外，高斌整治運河計劃，尚有：

- 一、修築新運口。乾隆二年（1737），配合通濟、福興等閘的興建，也將原運口往南移七十五丈，另闢新運口，與三汊河連接。新運口兩岸築鉗口草壩三道，稱為頭、二、三壩，閘門皆寬四丈，其中頭壩為入運門戶，最為關鍵；¹⁷
- 二、開通新運道。配合通濟、福興等閘的次第興建，高斌認為裡河廳舊有運道，與黃河僅隔一堤，惠濟祠居其中，形勢險要，遂奏請另闢新運道遠避黃河威脅。¹⁸ 乾隆三年（1738）四月，乃在惠濟閘下另開新河，長一、〇六八丈，寬二十餘丈。新河道完成於乾隆四年（1749），經大學士鄂爾泰（1677-1745）奏准，糧艘重運北上走舊河，船隻過後隨即堵閉，至漕船回空與商民船隻往來，則從新河行駛。¹⁹

以上有關乾隆初年裡河廳運道修建情況，軍機處檔案附圖中提供了具體所在位置，而相關文獻則提供了閘壩與河道修築緣起與規格等資料。直至十八世紀後期，高斌在江南河道總督任上對裡河廳修築的運口工程，依舊在淮揚漕糧運輸上發揮作用。²⁰

15 《南河成案》，卷3，〈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遵旨會議事〉，乾隆元年，頁27a-62a。

16 （清）國史館編，《皇朝河渠志》，清內務府朱絲欄寫本，黃河三十四，乾隆二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7 （清）胡裕燕修，《清河縣志》（光緒二年刊本），卷6，頁8b-9a。

18 《皇朝河渠志》，黃河三十五，乾隆三年。

19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66，頁72-73，乾隆三年四月甲午條；（清）衛哲治修，《淮安府志》，卷6，〈河防〉，頁108a。

20 （清）阿桂奉敕撰，《欽定南巡盛典》，清乾隆間朱絲欄鈔本，卷53，〈河防〉，頁53b，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束清敵黃——清口東西壩的設置與遷移

位於洪澤湖北方出水口處，其東西兩側分別築有壩臺，當時稱為「清口東西壩」，扮演著宣洩與調節洪澤湖水位，並以湖水衝刷黃流，遏止黃河倒灌的威脅。從乾隆時期留下的皇帝上諭，或河道官員奏摺資料中，具體反映清口東西兩壩在導引淮水、挹注運河、抵禦黃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乾隆皇帝上諭指出：

下游蓄洩機宜，惟洪澤一湖，尤為橐籥關鍵。……為釜底抽薪之策，則莫如廣疏清口，乃及今第一義。²¹

又繼高斌後接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高晉（1707-1779），也屢屢在奏摺中聲稱：「清口束水壩蓄洩洪湖，為全河第關鍵」；²²「清口東西壩啟閉機宜，為全河之關鍵」；²³「外河清口東西壩，攸關全湖蓄洩機宜，甚為緊要」。²⁴

清口東西壩，始建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為河道總督董安國任內創建，西壩長二十四丈，東壩長二十六丈，中留口門二十餘丈。就兩壩的分工上，西壩用以抵禦黃流，東壩則是透過壩口的拆展或收束，以控制洪澤湖水位，發揮濟運刷黃效果。即時人所謂：「西壩禦黃，東壩束清」的作用。康熙中晚期以後，隨著清口地區長期處於黃強淮弱的局面下，朝廷即曾先後兩次將西壩壩身加長提升其禦黃力量；但對用來束清的東壩，則始終未見有任何更動，從中反映康熙中晚期清口地區修防重點集中在西壩上。²⁵

然而，由於黃淮兩河漲落無常，水勢因時而變，康、雍兩朝對於兩壩口門收束的標準依舊處於一個模糊的概念，甚至執行時機也不免流於因循僵化。這樣的情況到了乾隆初年似乎仍未發生太大改變。例如乾隆二年（1737）河臣高斌、江蘇巡撫邵基（1687-1737）、兩江總督趙宏恩（？-1758）等人均奏稱：

21（清）高晉等奉敕撰，《南巡盛典》，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刊本，卷43，「河防」，頁48a，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第403015019號。

23《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第403015692號。

24《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奏摺〉，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初五日，第403018450號。

25 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頁98。

清口會黃東注入海，全資洪澤湖蓄洩得宜。……全湖之水，蓄聚有力，暢出清口。至冬春湖水微弱，每遇東北大風，則黃水灌入，應籌抵禦之策。……應於霜降水落之後，將清口西壩增長一、二十丈，以資收蓄。至伏秋清水盛漲，將清口東壩酌量開寬一、二十丈，則清黃足以相抵，而蓄洩俱為得宜。²⁶

上引內容所稱東西兩壩之間的收築與展寬，仍舊反映地方官員「順時啟拆」的觀念，冬春湖水微弱則收築西壩；夏秋大汛洪湖盛漲則拓寬東壩，但對於突發性的水勢漲落因應措施，卻未見具體對策。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即對此加以批評：

清口東西壩為淮水尾閘，會黃東注入海之關鍵。先是拘於蓄清成說，又慮多費工料，啟閉未能合宜，必俟山盱五壩過水，始議啟拆，每致淮水泛漲，由五壩旁洩高寶諸湖，為下河之患。²⁷

康熙後期既將清口修防重心集中在西壩禦黃的功用上，地方官員乃拘守東壩蓄清的成規不敢擅動，加上河防經費有限，清口東西壩發揮的功效仍相當有限。

乾隆二十年代，隨著清高宗第二、三兩次南巡，先後親臨清口視察，對於問題的嚴重性逐漸獲得較清晰的概念。²⁸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清高宗第二次南巡回鑾後，隨即傳諭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1761）：

內閣奉上諭：據白鍾山奏洪澤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現將清口束水東壩量行寬展，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等語。……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閘便減七、八分。……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口束水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其春夏之交，一遇水漲，即行展拓開闊。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便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²⁹

上諭內容中值得注意之處有三：首先，在秋冬淮水微弱，束水東壩照舊收築，至於

26 《清高宗實錄》，卷 40，頁 722，乾隆二年四月己巳條。

27 高晉奉敕撰，《南巡盛典》，卷 53，〈河防〉，頁 42b-43a。

28 張勉治的研究即指出乾隆即位初年江蘇地區水患不斷，幾已構成一場嚴重的國家危機，而此危機到乾隆二十年代依舊存在。見張勉治，〈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頁 20。

29 高晉奉敕撰，《南巡盛典》，卷 43，〈河防〉，頁 20a-b，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

春夏以後一遇水漲即行拓展。諭旨中明顯要求河道官員必須隨時因應水勢變化作出反應；其次，諭旨中提到因應水勢變化對東壩口門進行拓展，反映乾隆年間從康熙時期清口兩壩修防重心從西壩轉向東壩的變化³⁰；第三，此道上諭內容，對東西閘壩口門調整作出了具體規定，其主要是以高家堰三壩過水高低作為壩口拓寬的依據。

清口兩壩宣防重心的改變，基本原因是與乾隆二十年代淮河水勢變化有關。此在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間乾隆皇帝的上諭中得到具體的證明：

向以河臣惟事護堤，轉致湖漲，遂有一潰難收之勢，而清口則收束迫隘，託言濟運，不知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虞其少。³¹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高宗第三次南巡，此次對清口東西壩口門拆築標準又作了一番修正：

廣疏清口，乃及今第一義。現在測驗洪湖，高堰五壩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當即以此酌定成算。將來俟兩壩之水，如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仍存其蓄清之說。設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即將清口拆寬十丈，湖水以次遞長，則清口以次遞寬，總以上壩增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為準。其或入夏後水勢一時不常，旋長旋落，則不必以口門既展，急事堵塞，以過秋汛為定，逐漸收清口，仍至二十丈或十數丈，如此則全湖勢暢，以視求助於分支別派者，其功奚啻倍蓰哉！³²

與前次相較，此次上諭內容要求清口兩壩口門拆築標準作出了更有彈性的修正。考慮到原定標準洪澤湖高堰水位漲落一寸，清口東壩開寬二丈，但實際執行情況往往因水位變化瞬息萬變，地方官員未必能及時作出反應，加上壩口拆展耗時費工，壩口的拆築與水位的漲落未必能亦步亦趨。可以指出，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口東西壩拆築標準的修正，充分體現乾隆中期河工宣防制度上理性化管理的思考。而從該年開始，地方官員對清口水勢情報與東西壩口門拆築情況，也逐漸建立起制度性的報告。筆者根據目前所見相關檔案，除了部分年份資料缺漏外，整理出乾隆

30 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一文中亦指出康、乾間對清口東西兩壩修防重心也出現不同的變化。見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頁 99。

31 《南河成案》，卷上，〈上諭〉，頁 44a-45b，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

32 《南河成案》，卷上，〈上諭〉，頁 64a-b，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

二十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間清口東西壩口門拆展變化如文後【附表一】。這些數據變化，一方面反映乾隆二十七年後地方官員拆築兩壩有了具體依據標準，另一方面透過數據資料提供了解乾隆中、晚期洪澤湖水情漲落情況的大致趨勢。

乾隆四十年代以後，清口一帶地貌出現顯著的變化，諸如黃河河道的改變、灘岸的淤積、新河道及相應建設新堤壩的出現等。這些變化無疑與乾隆四十二年（1777）陶莊新河開通存在密切的關連性。有關陶莊新河問題，容下節再作討論。至於清口東西壩在乾隆後期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壩基歷經三次的遷移。茲整理如下表：

| | 壩址位置 | 創設時間 | 壩身長度 | 遷移距離 |
|----------|------|---------------|------------------------|-------|
| 1. 原設壩臺 | 風神廟 | 康熙 37 年（1698） | 82 丈 | |
| 2. 第一次遷移 | 平成臺 | 乾隆 42 年（1777） | 82 丈 | 160 丈 |
| 3. 第二次遷移 | 惠濟祠 | 乾隆 44 年（1779） | 168 丈 | 290 丈 |
| 4. 第三次遷移 | 福神菴 | 乾隆 50 年（1785） | 東清壩 100 丈 禦黃壩 258 丈 | 300 丈 |

配合院藏軍機處檔附圖數幅清口地區河道工程圖，即可以清楚了解其具體所在位置。除前文已知【圖一】至【圖三】所標示東西兩壩風神廟位置外，另院藏五幅清口地區輿圖，從【圖四】至【圖八】亦可分別找到所在位置。

【圖四】繪製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³³，應是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晉與江南河道總督薩載（？-1786）所呈的摺件附圖。此圖上南下北，黃色表示黃河河道，綠色為洪澤湖清水出口之處。圖中除以黃色簽條文字說明清口兩壩附近河道情況，並以紅色標記指出擬將兩壩遷移至平成臺的具體位置。³⁴ 圖左最上簽條中文字注出：

33 本圖在院藏軍機處摺件資料庫著錄時間為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所呈〈為恭報地方雨水情形及由蘇回省由〉一摺的附件。經比對《南河成案》有關奏摺，可以確定此圖應繪製於乾隆四十一年。見《南河成案》，卷 29，高晉、薩載等奏摺，〈會勘黃運河湖及海口淤墊事宜〉，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頁 19a-24b。

34 乾隆三十六年初，高晉一份報告江蘇省下河高郵、寶應地區運河水勢情形奏摺中，並提及清黃交匯處平成臺一帶出現黃水迴溜，淤沙沈積的情況，乾隆皇帝對平成臺一名產生了好奇，摺中硃批問到：「向來未聞此名，究在何處，繪圖貼說奏來。」據高晉覆奏稱：「查平成臺在於清口東岸風神廟迤下地方，向來原無此名，因乾隆十六年恭逢聖駕南巡，時臣叔高斌在總河任內，擬於該處建立平成臺一座，恭備聖駕南渡黃河後登臺閱視清黃交匯形勢，事未果行，後即於該處建立御詩亭一座，敬將渡黃詩鐫刻其上。自建亭以來，從此地方河工官民始稱為平成臺。」高晉覆奏附圖未見，但從檔案中透露出平成臺一地名稱的來源。見《南河成案》，卷 24，高晉奏摺，〈奏覆撈浚平成臺淤淺並遵呈圖說建立緣由〉，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日，頁 48a-51a。

東壩至舊運口計長一百八十二丈，因與清口切近，遇黃水倒灌，易於入運。乾隆二年奏明移進七十二丈，是為新運口，相距清口二百五十七丈，以避倒灌。

其下簽條注記：

東西壩今擬移下一百六十丈，在西岸灘上築堤一道，與平成臺處相對。該處河面寬八十二丈，與現在東西壩口面相同，俾其源遠流長，出口之勢更為有力。並將現在東西壩基址剷除淨盡，以免阻遏水勢。

【圖五】繪製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圖中清楚顯示兩壩業已築成，並將新、舊兩壩的相對位置具體標示出來。其西岸灘上東水堤同樣也修建完成，看來高晉等人的建議後來獲得乾隆皇帝批准施行。

【圖六】描繪出乾隆四十二年（1777）陶莊新河開通以後，由於黃清交匯處北移，清口洪澤湖水流經惠濟祠前河面頓變開闊，湖水到此散漫無力，不僅無法發揮刷黃效果，更當淮水微弱，黃河主峰即在惠濟祠前迴溜激蕩，造成漕運受阻，甚至可能發生倒灌威脅。乾隆四十三年六月間，經高晉與薩載兩人詳細商議，奏請於清口西岸續增東水堤一道，與先前所建的西岸東水堤連接，堤長六九二丈，藉以緊束洪湖的排水力道。³⁵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時高晉剛去世不久，繼任兩江總督薩載與新任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1799）兩人，將築成的新東水壩圖樣隨摺呈予乾隆皇帝御覽。³⁶ 圖中黃色簽條注記：「新建東水堤長六百九十二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五尺至九丈五尺，高七尺五寸至一丈二尺五寸不等，已一律如式完竣。」

【圖七】【圖八】分別繪製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與乾隆五十四年（1789），圖內已標記出清口東西壩其後兩次遷移所在位置。綜觀乾隆四、五十年代清口東西壩址三次的遷移，除與陶莊新河的修築，壩址座落位置隨著黃清交匯處北移而愈往北延伸外；另一方面，又與乾隆四十年代前後黃、淮兩河水勢強弱變化相關。這在下面數條資料中可以得到印證：

關於第一次遷壩背景。據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兩江總督高晉、江南河道總

35 《南河成案》，卷31，高晉、薩載等奏摺，〈清口西岸加築東水壩工〉，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頁21a-b。

36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薩載、李奉翰奏摺錄副〉，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第022971號。

督薩載一份奏摺中指出：

近年來，黃水時有倒灌，以致通湖引河淤墊，引河既已淺阻，則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之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以外之黃河兩腮，亦有淤高。……湖水不能暢出，遇黃水盛漲時，力不能抵，必致有倒灌之慮。一經倒灌，則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刷淤沙，即黃運兩河之淤墊，又所不免矣！……臣等再四熟籌，將清口東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在於平成臺之處建築，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之勢有力。³⁷

高晉等人奏稱近年黃強淮弱，運道淺阻，清水不能暢出，甚至擔心黃水倒灌的威脅，可見當時黃強淮弱對清口一帶的壓力。這樣的情況在【附表一】清口東西壩口門拆展變化中同樣得到進一步佐證。附表中自乾隆三十八年下旬至乾隆四十一年春夏間，清口東西壩口門寬度幾乎都維持在二十至四十丈之間。這是當時在長期清水微弱，對壩口收窄藉以束清禦黃所採取的措施，時間竟長達年餘之久。將壩基北移，試圖透過拉長洪湖排放清水的距離，以提升清口出水力度，此即上引高晉摺中所謂「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之勢有力」的深意。

關於第二次遷壩背景，據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新任兩江總督薩載、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合摺奏說：

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一帶，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其力亦覺紆緩。若將清口壩工移下里許，逼清抵黃，似更得力。³⁸

主要原因也是基於解決黃水倒灌威脅、提升湖水出口力度的考量出發。

至於第三次遷壩原因，既是天災，也是人為因素所促成。乾隆四十八年發生河南青龍崗決口，黃河斷流，大水湧入淮河，洪澤水勢暴漲，江蘇地方官員避免使洪湖盛漲之水漫入下河淮揚地區，隨即將東西壩口門拆寬，俾使清水暢出。豈料四十九年河南大工合龍，河歸故道後，黃水突發盛漲，江蘇河道官員卻未能適時將原已拓寬的壩口加緊收束，延至五十年（1785）春夏之交，淮河大旱，清水無出，以致無法抵禦東趨黃流，結果黃河湧入，運道為泥沙所淤，清口竟為黃流所奪。情

37 阿桂奉敕撰，《欽定南巡盛典》，卷44，〈高晉、薩載等奏摺〉，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頁13a-17b。

38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兩江總督薩載、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摺錄副〉，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第024445號。

況的嚴重引起乾隆皇帝的關切，並派遣阿桂（1717-1797）為欽差大臣南下，會同河道官員進行徹底整治。據乾隆五十年九月十五日阿桂抵達清口後的勘察報告中指出：

……查清口東西壩，向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上年豫省雖工漫溢以後，……淮河上游處處被旱，湖水異常淺少。薩載、李奉翰並未將現在情形應機達變，先事預籌將清口兩壩再加收束，以為蓄水地步，惟希冀湖水接續加長，即可暢出，引河濟運。及至春夏缺雨，淮水並未長發，六月以後，湖水遂涓滴無出，黃水倒灌，運道淤淺。³⁹

面對嚴峻的局面，阿桂等人商議再將清口東西壩往北遷移三百丈，改設於惠濟祠下福神菴一處。該處河寬二八五丈，兩壩亦建至二八五丈，並將東壩做長以擋禦黃水迴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同時，為防止黃流再度倒灌清口，淤塞運道，又在原有風神廟處重修東西壩，藉以兜束清水，協濟運道。前者用以禦黃，稱「禦黃壩」，後者用以束清，稱「束清壩」，這是清口東西壩建壩以來，首度將兩壩功能劃分。對於阿桂的建議，乾隆帝的閱覽高度肯定，在摺中寫下「此法是極」的硃批。⁴⁰

乾隆一朝，在治河修防對策上可謂極盡苦心，投入許多著名治河官員，先是試圖確立清口東西兩壩拆築標準，希望在束清刷黃發揮作用；其後又將壩址多次遷移，藉此加強治黃、導淮、濟運功效。誠如乾隆年間勘稱治河能手的高晉也曾說：「洪澤湖東西兩壩，尤為黃運關鍵。……治淮即以治黃，導黃即以利運。」⁴¹ 治黃難，治黃卻又同時兼顧治淮、治運，更談何容易。當乾隆朝君臣經歷多次挫敗經驗後，事實證明，各種方案不過只能說是一種補偏救弊的對策。然而，各種對策中，乾隆四十二年陶莊運河的開通，就乾隆朝清口地區防河史上，其產生的影響，較之東西兩壩更值得注意。

39 《南河成案》，卷 39，阿桂奏摺，〈查辦清口淤墊辦理不善覆奏〉，乾隆五十年九月十五日，頁 50b-51b。

40 仁和琴川居士編，《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66，〈阿桂奏摺〉，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日，頁 14a-18b。

41 （清）高晉奉敕撰，《南巡盛典》，卷 52，〈河防〉，頁 7a。

四、從清黃互爭到清黃並行——乾隆四十二年陶莊新河的開通

乾隆時期諸如運口的改移、運道閘壩的興修、清口東西壩的管控拆展方面，其制度化與管理合理化上，相較於前朝都有顯著進步與加強。然而，當面臨黃河肆虐之際，種種已有的防禦工程卻又顯得束手無策。其根本原因，主要在於未見針對黃河河道本身提出整治對策。直到乾隆四十年代，隨著陶莊新河的開通，河患威脅才漸見紓緩，在河政上也終於獲得短暫穩定的時期。

陶莊，是江蘇淮安府清河縣黃河北岸的一個市鎮，屬外河廳管轄範圍。自康熙年間為整治河患，陶莊一處即已受到清廷高度重視。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聖祖第三次南巡，親臨江南閱視清口一帶河工後，即下令在陶莊一處開挖引河，試圖將黃河河道導引北注，遠離清口，以解除河水倒灌威脅。與此同時，又下令在陶莊對岸興築挑水大壩一道（當時稱為御壩），引導黃河分注引河，並諭令河道總督董安國、清河道馮佑負責督工。然而引河完工正要放水開通之際，河臣竟未顧及當時黃水消落變化，以致引河開通未久旋即淤塞。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間，康熙皇帝再度派遣欽差與河臣張鵬翮（1649-1725），對淤塞的陶莊引河進行挑濬。挑成引河長七八〇丈，寬三十丈，深一丈三尺。但開放不久又因河水消落，引河中段淤墊。之後又分別在康熙五十一（1712）、五十三（1713）兩年間命令河臣趙世顯派員挑濬，但屢挑屢塞，始終徒勞無功。至雍正八年（1730），黃河坐灣南趨，北岸陶莊一帶淤沙沉積，黃河全趨故道，陶莊引河工程遂告失敗。⁴² 至康熙皇帝最初修建原意作為挑水壩導引河水北趨陶莊的御壩工程，由於河道南趨，御壩頓成險工。雍正八年，中央諭令在壩前修建頭二三處盤頭壩，以減緩洪流逼迫壩身的壓力。⁴³

康熙朝陶莊引河工程的失敗，一方面既由於河臣開河未能充份把握水勢時機，以致旋開旋淤；另一方面，亦由於康熙朝開挑陶莊只作為一道引河，河水分流，水緩沙積，未能發揮導引水流的作用。

乾隆四年（1739）間，前述高斌修建裡運河閘壩並移建運口未久，卻發生黃水倒灌、運道受阻的問題，並引發淮揚地區在京官員對工程的嚴厲指責。清高宗遂欽派大學士鄂爾泰南下進行調查，據鄂爾泰勘察後報告指出，運道工程與黃水倒灌無關，實由於清水微弱，黃強淮弱所致。但為求根治黃河倒灌問題，鄂爾泰奏請再次

4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江南河道總督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403031295號。

43 （清）胡裕燕修，《清河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卷6，頁2a-b。

開挑陶莊引河，才是根本解決之道。⁴⁴ 他的建議無疑與康熙朝的對策如出一轍，也反映陶莊地位的重要性。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鄂爾泰更親身赴陶莊一帶勘探舊河，拜訪舊日河員，總結康熙朝挑河失敗的原因有三：一、河身太長；二、河形稍曲；三、未審河溜而放水過急。⁴⁵ 鄂爾泰認為吸收了前朝經驗，開挖陶莊引河必定成事。河開成後，清口黃淮兩河現有的佈局也將改變：「前此清黃互爭者，今則清黃並行」。經請准後，引河挑挖工程遂在乾隆四年上旬展開，委由河道總督高斌興辦，估計五月竣工，秋汛待河水盛漲放溜開河。新挑引河長四六〇餘丈，寬三十丈，深一丈三尺。⁴⁶ 與康熙朝引河相較，除寬深一致外，引河長度確實大為縮減。然而，相當可惜的是，鄂爾泰主導的挑河工程，最終仍舊落入失敗的命運。高斌事後指出：

清口北岸陶莊舊漲沙灘，黃溜南趨，……大學士伯鄂爾泰議奏復開引河，並於南岸再築挑水大壩。……不意大水驟至，引河趕挑無及，築壩亦難施工。俟秋汛水落後，再相機辦理。經臣具摺奏明。至秋汛後，水落灘現。察看情形，其灘形較前低下五六尺恐水長易漫，開挑引河難望成功。⁴⁷

陶莊引河工程的開鑿，歷經康熙、雍正、至乾隆初年，祖孫三代不斷的努力，試圖克服重重困難，希望能夠透過人為力量改變自然河道流向，最終依舊無法達成。然而，黃患終究仍須面對，大溜南趨的問題同樣尚待解決，經過多次的勘察與考量，高斌遂採納清河縣丞李昞的建議，仿宋代陳堯佐（963-1044）木龍之制，在清口南岸御壩前安設木龍數架（一種以木材架築的臨時挑水壩），導引河水直趨清口北岸，南岸沈積淤沙護岸。⁴⁸ 這個方法結果證明相當有效，也獲得乾隆帝的肯定。至此，清口南岸出現了一種新的河工技術，木龍工程大肆開展，河岸整排木紮人工挑水壩，成為清口一個特殊景觀。⁴⁹ 有關木龍的具體功效，據高斌描述：

44 《皇朝河渠志》，黃河三十六，乾隆四年。

45 《皇朝河渠志》，黃河三十六，乾隆四年。

46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江南河道總督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403031295 號。

47 《南河成案》，卷 5，〈工部題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題本〉，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頁 21a-b。

48 有關李昞生平資料相當有限，所知他是湖北漢陽人，字雙士，生平不詳。《清河縣志》載監生出身，乾隆五年任清河縣丞，向河督高斌獻木龍策，因功獲乾隆皇帝褒獎，提拔陞遷，後官至江蘇揚州府泰州同知。李昞後來將木龍的建置形制寫下《木龍書》一本，成為保存中國古代治水技術的珍貴材料。見李昞，《木龍書》，收入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冊 233。

49 《南河成案》，卷 9，〈御壩木龍〉，乾隆十五年，頁 30a-31b。

自建設以來，歷經桃伏秋三汛，黃河大溜盡趨北岸，陶莊沙灘舊寬一百九十餘丈者，止存九十餘丈，已漸次刷去一百餘丈。其南岸頭二三壩舊稱險工，今俱淤閉，埽外漲成沙灘，寬三、四十丈至一百七、八十丈不等。黃溜中泓，現行陶莊引河之舊址。清水出口較前甚暢，會黃東注入海。臣查北岸沙灘刷去，黃流業經北徙，陶莊舊引河已可毋庸開挑，南岸亦不須更建挑水大壩。⁵⁰

隨著木龍工程試驗的成功，修築陶莊引河對高斌而言已沒有施行的必要。乾隆十四年（1749），高斌再度就清口一帶木龍運作情況向乾隆皇帝報告：

臣高斌于乾隆五年奏請添設木龍數架，以挑黃溜。……木龍挑溜漲灘，將頭二三壩險工盡行淤閉。每年節省工料甚多，其上游漸漲淤灘，栽種柳株，北灘漸次塌卸，已有成效。⁵¹

但由於清口出水受黃流阻隔，迴溜沖刷南岸積土，勢將有礙積沙護灘的成效。其因應對策，高斌在奏摺中進一步報告陸續修建防禦工程情形：

于清口西壩之外，添築攔截壩一道，長十丈，又迤上添築順黃壩一道，長十丈，又于兩壩各加幫雁翅，共三十一丈；又於添建木龍下尾，接築攔截迴溜草壩一道，長二十二丈。……自添建木龍，築成壩工以後，黃（流）挑向北趨，直逼陶莊積土。……陶莊積土，漸次塌卸已去大半，……新淤灘長六百餘丈，寬六、七十丈不等；又二層新灘長五百餘丈，寬八九十丈不等，今水落灘現，臣等目睹情形，所添木龍挑溜得力，壩工停淤應手，積土塌去大半，河溜順軌，成效顯然。⁵²

從【圖二】【圖三】可清楚看到乾隆十三、十四年間高斌在清口一帶工程施行情況，圖內也具體描繪出木龍設置後，當地河灘地貌發生的改變。

然而，木龍挑溜護岸固然有效導引黃河平時北趨東注，但對於黃河瞬間發生

50 《南河成案》，卷5，〈工部題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題本〉，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頁22a-b。

51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摺錄副〉，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005027號。

52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摺錄副〉，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005027號。

暴漲，大水湧現局面時，木龍挑水壩並未見有多大護河功用⁵³；另一方面，透過自然水力沖刷北岸陶莊積土，對新積嫩沙或許能發揮作用，但對久已膠結凝固的積土而言，其功效也相當有限。例如乾隆四十一年兩江總督高晉等人的奏摺中即提到：

清口之西所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水不致逼近清口之意。歷年以來，積土陶莊雖已刷去大半，著有成效。但積土根基凝結，驟難盡刷。⁵⁴

又另一份奏摺同樣也指出：

西壩一帶逼近黃河，自建設木龍以來，挑溜東行，淤出灘面，寬自一百四、五十丈至三百三、四十丈不等，甚為有益。然遇黃水盛長之時，大溜直趨惠濟祠前，逼溜倒灌，入溜清口，此一帶雖經修有磨盤埽壩攔禦，而黃流勢甚，仍屬無濟。⁵⁵

乾隆四十一年（1776），當清口地區又一次遭遇黃流倒灌，運道再次嚴重淤塞的問題，終於促使乾隆皇帝皇帝不得不重新思考開通陶莊引河的可行性。《皇朝河渠志》中曾記錄乾隆皇帝的一段話：

予以為陶莊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適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巡撫薩載各來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河務，以為海口淤泥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視。⁵⁶

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薩載返抵江南後，即與總督高晉細心酌商，並親身履勘，測量地勢，於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具摺並附圖向乾隆皇帝覆命，除建議將清口東西壩下移一六〇丈置於平成臺外，並提出開挑陶莊引河的可行性及初步構想。乾隆皇帝覽摺大喜，分別在奏摺中批示：「此奏甚合機宜形勢，是治黃淮一大關鍵。屆時妥為之」；而在圖上指出：「將所圈處放一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此時尚未興

53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即曾建議再度復開陶莊引河，正反映出木龍工程的侷限性。但其後資料並未有關於任何陶莊引河開復的記錄，看來白鍾山的建議並未被朝廷所採納。見《南河成案》，卷14，〈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摺〉，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頁95a。

54 《南河成案》，卷29，〈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頁22b。

55 《南河成案》，卷29，〈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頁39b-40a。

56（清）國史館編，《皇朝河渠志》，黃河七十，乾隆四十二年。

工，正好相商也。」⁵⁷ 接到皇上發回的硃批奏摺後，六月間，高晉等人依指示具奏附圖呈覽，並在圖中依各處修建工程詳細貼簽說明。軍機處檔案所藏【圖四】，即為當時高晉呈覽的繪製圖樣。圖中右方分別就陶莊引河工程貼簽說明：

- 一、在清口南岸木龍位置：「此一帶自建設木龍來挑溜東行，淤出灘面寬自一百四、五十丈至三百三、四十丈」；
- 二、在第三木龍位置左手，標出紅色圈記，並注明：「此處俟對岸引河挑成，應做一挑水壩挑溜，俾其全歸引河，迤下各架木龍將來均可停止」；
- 三、以紅點標示出未來陶莊引河開挑位置，並注明：「此處擬挑引河一道，計長一千零五十丈，使黃河改由此行出周家莊，會清東注，越過惠濟祠，相距清口較遠，則清黃並流歸海，可免倒灌之虞，并收清水刷沙之益」。

乾隆皇帝閱讀後，隨之在圖上批示：「引河覺窄，應加寬。」同時透過軍機處發出了一道上諭：

朕批閱圖內所繪引河，形勢尚覺太窄，已於圖內批示。從來河不兩行，既經開挑引河，則黃水大溜即應由引河行走，必須開挖寬深，方能引溜全注。細閱貼說，但稱計長一千零五十丈，而於寬深丈數，均未奏及。……此項引河為黃淮緊要關鍵，若果能開放深通，使黃流不致停淤，清水得以暢出，實為最善之舉，即多用帑金，亦所不惜。⁵⁸

就【圖四】上看，高晉似乎要開的僅是一道「引河」，而乾隆要開的竟是一條「新河」。這不能不說是乾隆皇帝的睿智與決斷，也反映出他自即位以來長年累積對河務的了解。當他回想皇祖康熙皇帝及其即位初年開挑引河的失敗教訓，陶莊引河之所以旋挑旋淤，正因為一河兩行的結果。陶莊引河工程，正體現著乾隆皇帝整治清口的企圖心，並宣稱耗費巨資也在所不惜。

欽奉上命，高晉等人隨之再詳細規劃，透過君臣之間數度往返商酌，終於落實開挑陶莊工程的具體規劃，其後相繼釐定出因應新河開通後的各式禦黃方案：

- 一、引河長度一、〇六〇丈，引河頭挑寬四十丈，河身挑寬三十五丈，河尾挑寬

57 《南河成案》，卷29，〈高晉、薩載等奏〉，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頁19a-24b。

5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社出版，1991），冊8，〈軍機處寄進上諭〉，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頁312。

- 三十丈，較原定河身拓寬三分之一，引河底擬挑深一丈至一丈五尺。⁵⁹
- 二、因河面寬闊，除移建木龍之外，於引河對岸另築做挑水壩，兩重挑逼，引導黃河大溜注入引河。⁶⁰
- 三、於新河開通後，興築清黃界壩一道，長約一〇四丈，將舊河道盡行堵閉，使黃流全歸新河。⁶¹
- 四、清黃界壩修建後，於壩外斜築攔水壩一道，計長一四〇丈，接連至舊清口西壩頭。⁶²
- 五、又於清黃界壩上首，加築壩工一道，以為重門保障。壩身長一三〇丈，頂寬五丈，此壩後因其直接面向黃河，取名「順黃壩」，原清黃界壩則稱為「攔黃壩」；此外將木龍所在位置重新調整，其木龍原設置於舊河道者，因河身業已堵閉，即將其拆起遷移，或移置於頭木龍迤上，藉以加強挑溜的效果。⁶³
- 六、為防範順黃、攔黃兩壩舊河道原有積水，造成侵蝕壩基的後患，乾隆皇帝諭令將其他地方修築土堤挖出的淤土，運至塘內填平，並於地上修建神廟，以酬神貺。⁶⁴

以上各項工程，皆可在文後【圖五】至【圖十】中看到。其最突出之處，隨著陶莊新河修築完成後，清口地貌出顯著的改變，黃河改道，堤岸遷移，堤壩林立的景象較乾隆四十年代以前更為壯觀，也不能不驚嘆乾隆朝君臣動員力量上的決心，以及整治河工的毅力。當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間陶莊新河竣工之際，河道官員同樣也吸取了以往失敗經驗，人為的努力已盡，期待著是時機的來臨與上天的眷佑。河臣們謹慎而為，等候著明年春暖冰融，水勢長發，以考驗君臣間辛苦的成果。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期待已久的陶莊新河在眾多河道大小官員之下，撤除壩基，全黃大溜灌注，水到渠成，正式宣告新河工程的成功。乾隆皇帝聞訊大喜，除了肯定官員們的努力外，也感念上天眷佑。當回顧康熙朝七十餘年來整治清口修防奮鬥的過程中，乾隆皇帝終於在任內實踐了皇祖的宿願。他隨之透過內閣發佈了一道上

59 《南河成案》，卷 29，〈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頁 53a-b。

60 《南河成案》，卷 29，〈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頁 53a-b。

61 《南河成案》，卷 30，〈高晉奏摺〉，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頁 72b。

62 《南河成案》，卷 30，〈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一日，頁 76b。

63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高晉、薩載奏摺〉，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第 403031171 號。

64 《乾隆朝上諭檔》，冊 9，〈軍機處寄信上諭〉，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頁 49。

論：

黃河大溜改由陶莊北行，離清口甚遠，可免黃河倒灌之虞。並收清水刷沙之益，即就近險工，亦俱化為平穩。……所辦引河，實為全河一大關鍵，非尋常築堤、打埽、開河者可比。⁶⁵

為慶祝陶莊新河的開通，乾隆皇帝還特地撰寫碑記，一方面紀念這次盛舉，同時也為了感念上天的眷佑。碑文中寫道：

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若易，盡人力而為之，然終於弗成者，則以天弗助，神弗相，而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為之，而終於有成者，則以天所助，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故舉大事，必當審事機、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天助神相，則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闕一焉！吾於陶莊引河，益信此理之不爽。……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1699），逮今乾隆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65），歷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豈非時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天助神相之所致耶？⁶⁶

陶莊新河的開通，不僅成功地使清口地區確立起更為多重性的禦黃工程體系，在為清代治河史上寫下新的一頁。道光年間曾任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對陶莊新河開通後清口一帶地貌的改變也曾有以下的描述：

乾隆四十二年總河薩誠恪公議挑新河既成，四十三年將攔黃壩、順黃壩中間水塘填平，從此二瀆劃分。……垂今六十餘年，河尾淤灘漸長，清黃交會之處愈遠，雖因河底墊高，倒灌仍所不免，而清口西岸一帶，昔為黃溜經行之地，今則民居稠密，情形迥異矣。⁶⁷

65 《乾隆朝上諭檔》，冊8，〈內閣奉上諭〉，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頁579。

66 清高宗撰，〈陶莊河神廟碑記〉，收入阿桂奉敕撰，《欽定南巡盛典》，卷24，頁22b-27a。

67 （清）麟慶，《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乾隆五十年河口圖說〉。

五、結論

自十二世紀黃河奪淮以後，歷經數百年間，治黃、導淮、濟運，三者如何能夠兼顧，始終成為中國歷代政府治水的一大困局。十八世紀中國繼承了這一份「遺產」，成為清代政府難以面對卻又必須面對的難題。經歷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訓練出許多出色著名的河臣，他們世代累積，建立起豐富的治河經驗。然而，從對黃河奮鬥歷程上觀之，他們的努力也僅能是維持短暫的平穩局面。本文透過乾隆一朝治河過程，濟運方案如高斌對裡運河閘壩與運口的修建，導淮對策如清口東西壩的遷移，治黃方案如陶莊新河工程的成功，從中可見時人為克服黃河易淤、易徙、易變的特性上，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經濟的穩定發展不僅是社會民生安定的基礎，更是王朝政權與國家稅賦的重要依據。河道穩定與國家政權具有密切的關連，把傳統中國視為「水利國家」、「工程國家」絕不為過。但如何有效管理河道，就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調動人力物資，實施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程。⁶⁸ 十八世紀乾隆年間，在國家動員能力與國庫儲備日趨充裕的情況下，在推行大規模的水利計劃，皆能展現出政府的魄力與決心，尤其是乾隆四十年代後，隨著國庫充盈，才得以開展各種水利工程以面對日益頻繁的河患。鄭肇經《中國水利史》一書中曾對乾隆時期治河政績給予如下的評價：

乾隆承康、雍治河之後，修防之工愈重，……尤注意南河，並大治與黃河有關之各處水道。在乾隆三十年代以前，可稱為河工的鼎盛時期，三十年代以後，稍稍替矣。⁶⁹

鄭肇經的評述，雖然肯定乾隆一朝治河的努力，但認為乾隆三十年代後治河工程逐漸衰微，看來並非事實。剛好相反的是，在乾隆朝重大治河工程上，卻是 30 年代後日見增加，工程規模與密度也遠超於繼位前期。從院藏軍機處河工圖與相關檔案紀錄上，也說明乾隆 30 年代後，隨著乾隆皇帝治河知識日趨成熟，工程的廣度與深度都有更高的發展。

總言之，院藏軍機處檔案附圖中留下豐富的證據，透過文獻資料的論述，也賦

68 David Allen Pietz 著，姜智芹譯，《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2。

69 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北京：商務印書局，1993），頁 76-77。

與這些工程圖更為鮮明的歷史圖像，工程所在位置的描繪，人文地理面貌的變遷，其中反映國家政府的努力，都使一幅幅原先個別獨立，似乎互不相關的圖像串連成歷史的對話，這些河工輿圖，不僅提供君臣間討論水利工程的重要依據，也成為今人考察傳統中國整治河工的珍貴資料。

後記：本文是 2012 年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及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共同合辦之「海洋、空間意識與文化交會：第二屆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文章，會議中承蒙評論人蔡泰彬教授給予寶貴建議，謹致謝忱。然而工作繁重，時光荏苒，匆匆數載，本年初始行檢拾原稿擬作修正發表，惟個人在河工史領域只是起步階段，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寬容才得以發表，在此亦致上深切謝意。對於本文疏陋不當之處，本人自當負全部責任。

附表一 清口東西壩口門拆展變化表

| 乾隆 | 正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閏七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12年 | | | 8丈 | | | | | | | | | | |
| 22年 | | | | | | | | | | | | 30丈 | |
| 27年 | | | 20丈 | 30丈 | | | 40丈 | | | | 17丈 | | |
| 28年 | | | 17丈 | | 27丈 | 27丈 | ◇37丈 ◆50丈 | | 28丈 | | 20丈 | | |
| 29年 | | 40丈 | 50丈 | | | 47丈 | | | 40丈 | 20丈 | 17丈 | | |
| 30年 | | 17丈 | 27丈 | 37丈 | | 67丈 | | | 34丈 | 17丈 | 14丈 | | |
| 31年 | | | | | | | ◇72丈 ◆57丈 | | ◇37丈 ◆53丈 | 37丈 | 20丈 | | |
| 32年 | | | | | 26丈 | ◇58丈 ◆67丈 | 72丈 | | 72丈 | ◇20丈 ◆16丈 | | | |
| 33年 | | | | 16丈 | | 16丈 | 13丈 | | 10丈 | 12丈 | 10丈 | | |
| 34年 | | | 22丈 | 35丈 | 47丈 | | 50丈 | | 16丈 | 12丈 | 8丈 | | |
| 35年 | | | | | | | | | 47丈 | 20丈 | 14丈 | | |
| 36年 | | | | 10丈 | 6丈 | 4丈 | ◇14丈 ◆34丈 ◆48丈 | | 62丈 | 67丈 | 45丈 | 16丈 | |
| 37年 | 12丈 | 12丈 | 22丈 | 22丈 | ◇37丈 ◆52丈 ◆62丈 | 62丈 | 52丈 | | 16丈 | 16丈 | 12丈 | | |
| 38年 | | | 62丈 | | | | | | 20丈 | | 20丈 | | |
| 39年 | | | | 30丈 | 30丈 | 30丈 | 30丈 | | 20丈 | | 30丈 | | |
| 40年 | | 20丈 | 28丈 | | | | | | | | | | |
| 41年 | 25丈 | 30丈 | 35丈 | 40丈 | | | | | | 21丈 | | | |
| 42年 | | | | 21丈 | | | 45丈 | | | 26丈 | 20丈 | | 16丈 |
| 43年 | | | | | | | ◇30丈 ◆40丈 ◆50丈 | | 62丈 | | | 38丈 | 20丈 |

| 乾隆 | 正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閏七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44年 | | 20丈 | 38丈 | ◇45丈 ◇53丈 ◇60丈 | 82丈 | 82丈 | | | | | | 30丈 | 20丈 |
| 45年 | | | | | | | | | 90丈 | | 74丈 | | |
| 47年 | | | | | | | | | 60丈 | | | | |
| 48年 | | | | | 30丈 | | 30丈 | | | | 20丈 | | |
| 49年 | | | | | | 32丈 | ◇60丈 ◇85丈 | | | 30丈 | 30丈 | 20丈 | |
| 50年 | | | | | | | | | | | | | |
| 51年 | | | 8丈 | | | ×50丈 ×20丈 | ×60丈 ×120丈 | | ×115丈 ×208丈 | | | | |
| 52年 | | | ×35丈 ×30丈 | ◇×45丈 ◇×40丈 ◇×55丈 ◇×50丈 | ◇×75丈 ◇×75丈 ◇×115丈 ◇×120丈 | ◇×168丈 | ×250丈 | | | | ◇×30餘丈 ◇×40餘丈 ◇×12丈 ◇×20丈 | | |
| 53年 | | | | | ×36丈 ×30丈 | ◇×72丈 ◇×80丈 ◇×98丈 ◇×125丈 | ◇×115丈 ◇×160丈 ◇×115丈 ◇×250丈 | | ×115丈 ×250丈 | ×55丈 ×150丈 | ×12丈 ×20丈 | | |
| 54年 | | ×12丈 ×18丈 | ×12丈 ×18丈 | | ×24丈 ×36丈 | ×118丈 ×175丈 | | | | | | ×12丈 ×18丈 | |
| 55年 | | | | | | ×115丈 ×250丈 | ×115丈 ×250丈 | | | | | ×12丈 ×18丈 | |
| 56年 | | | | | | ×100丈 ×134丈 | | | | | ×12丈 ×18丈 | | |

符號說明：◇表示月份上旬、◇中旬、◇下旬；×：東清壩；×：禦黃壩

資料來源：1. (清)佚名編，《南河成案》，收入李荊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

2.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清)國史館編，《皇朝河渠志》，清內務府朱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佚名,《黃河工程圖》,清乾隆年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佚名編,《南河成案》,收入李莉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
- (清)李昉,《木龍書》,收入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阿桂奉敕撰,《欽定南巡盛典》,清乾隆間朱絲欄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胡裕燕修,《清河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華中地方·江蘇省,第465號。
- (清)國史館編,《皇朝河渠志》,清內務府朱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載齡等修纂,《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1。
- (清)衛哲治修,《淮安府志》,乾隆十三年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700。
- (清)麟慶輯,《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清道光二十一年雲蔭堂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9輯,冊6。
-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社出版,1991。

二、近代論著

- 仁和琴川居士編,《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1989。
- 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中州學刊》,2003年3期,頁97-100。
- 李孝聰,〈黃淮運的河工輿圖及其科學價值〉,《水利學報》,39卷8期,2008年8月,頁947-954。
- 李倩、程杰、徐業龍,〈大運河淮安段的修築及其演進〉,《淮陰工學院學報》,19卷4期,2010年,頁1-9。
- 季祥猛、范成泰、朱興華、戴甫青,〈古清口的興盛與變遷〉,《中國水利》,2008年8期,頁60-63。

- 席東會，〈高斌『南河圖說』與乾隆首次南巡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7卷2輯，2012年，頁132-142。
- 席東會，〈歐洲所藏清代《南河圖》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7期，頁118-126。
- 席東會，〈讀圖時代與水利國家——河渠水利圖與康熙朝河政〉，收入《『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變遷』研究生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9，頁624-634。
- 袁飛、馬彩霞、朱光耀，〈小議康乾時期治河活動中的利益沖突〉，《安徽農業大學學報》，17卷6期，2008年，頁127-129。
- 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6。
- 張勉治著，唐博譯，〈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清史譯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6，頁6-60。
- 張衛東，〈黃淮交匯時期的清口〉，收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編，《歷史的探索與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6，頁117-125。
- 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治河》，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1998。
- 鄭永昌，〈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簡介〉，《故宮文物月刊》，348期，2012年3月，頁4-5。
- 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北京：商務印書局，1993。
- David Allen Pietz 著，姜智芹譯，《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Topographical Changes and Riv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Qingkou Area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A Study on Illustrations of River Management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Cheng, Wing-cheo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with its changeable course and tendency to burst its banks, has long been a major government concern of Chinese dynasties over the a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orth depended on the Grand Canal for the transport of grain from the south. However,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anal with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Huai'an-Qingkou area in Jiangsu made shipments on the canal to the north heavily dependent on Yellow River conditions. Flooding of the canal by river water would cause blockage, meaning that managing the Yellow River was essential to the flow of goods on the canal. In the early Kangxi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Fangxing, General Supervisor of Rivers and Canals, pointed out that "managing the river meant managing the canal." Th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conservation of the river not only could prevent flooding but also maintain the local economy. Even more important was ensuring a stable supply of national revenue to the capital. For this reason, the Qing government invested a great amount of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n closing dikes, their repair and protection being the key to achieving this goal.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re paintings prepared by officials in charge of waterways that describe the repair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done on them.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se illustrations come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providing scholars with a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changes for studying the waterways and the policies for their management adop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time. This study searches for clues in ten illustration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Yellow and Huai Rivers at Qingkou. Judging from the period of painting for these illustrations, the memorials prepared by official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s on them, they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ographical changes to the waterways and the formation of policies for projects dealing with the Grand Canal, Huai River, and Yellow River in the Huai'an-Qingkou area of Jiangsu.

Keywords: Qianlong era, Jiangsu, Huai'an, Qingkou, co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at Qingkou, archives of the Grand Council, illustrations of river construc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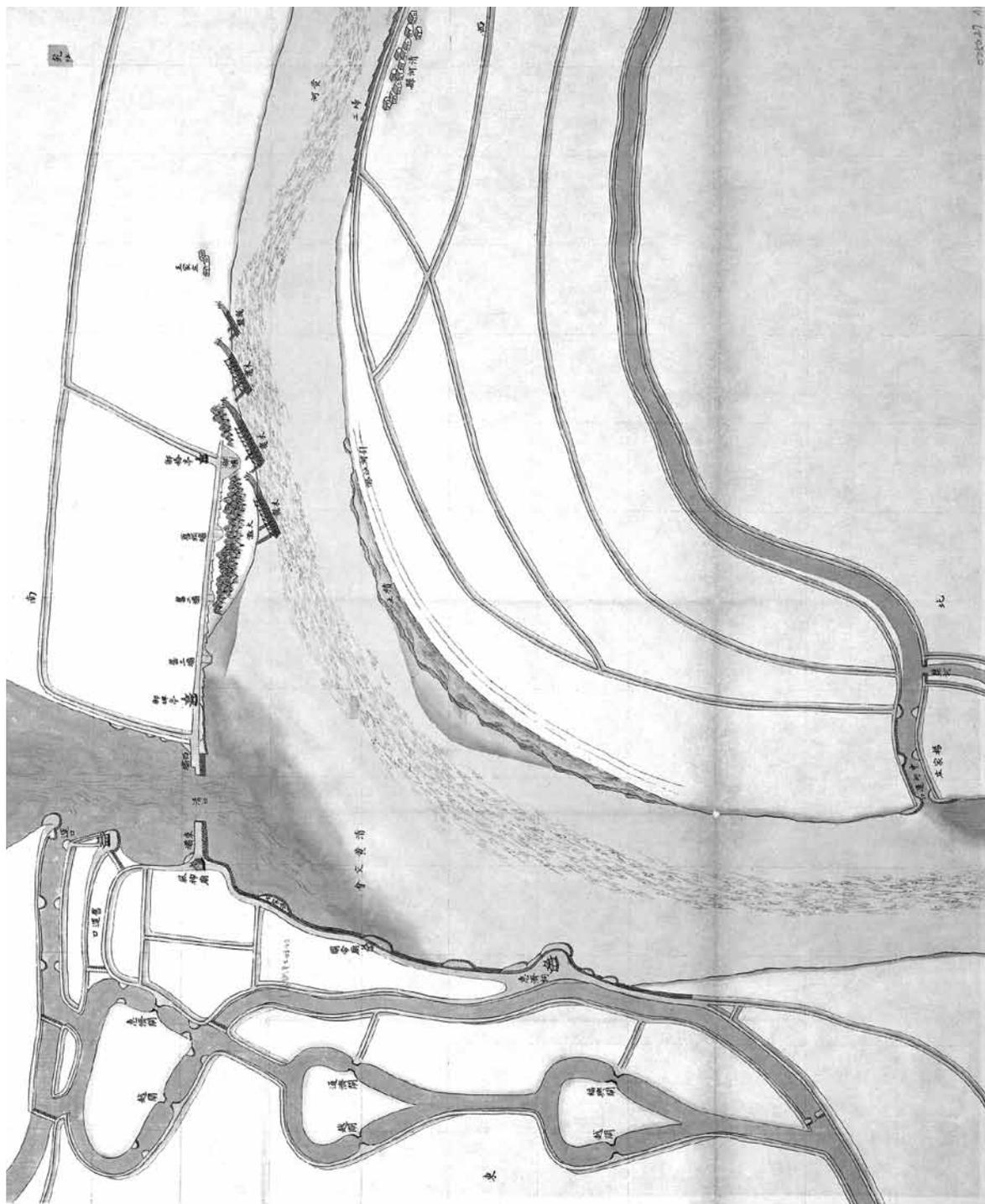


圖1 〈雍正十三年黃河清口木龍圖〉，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文獻編號：00502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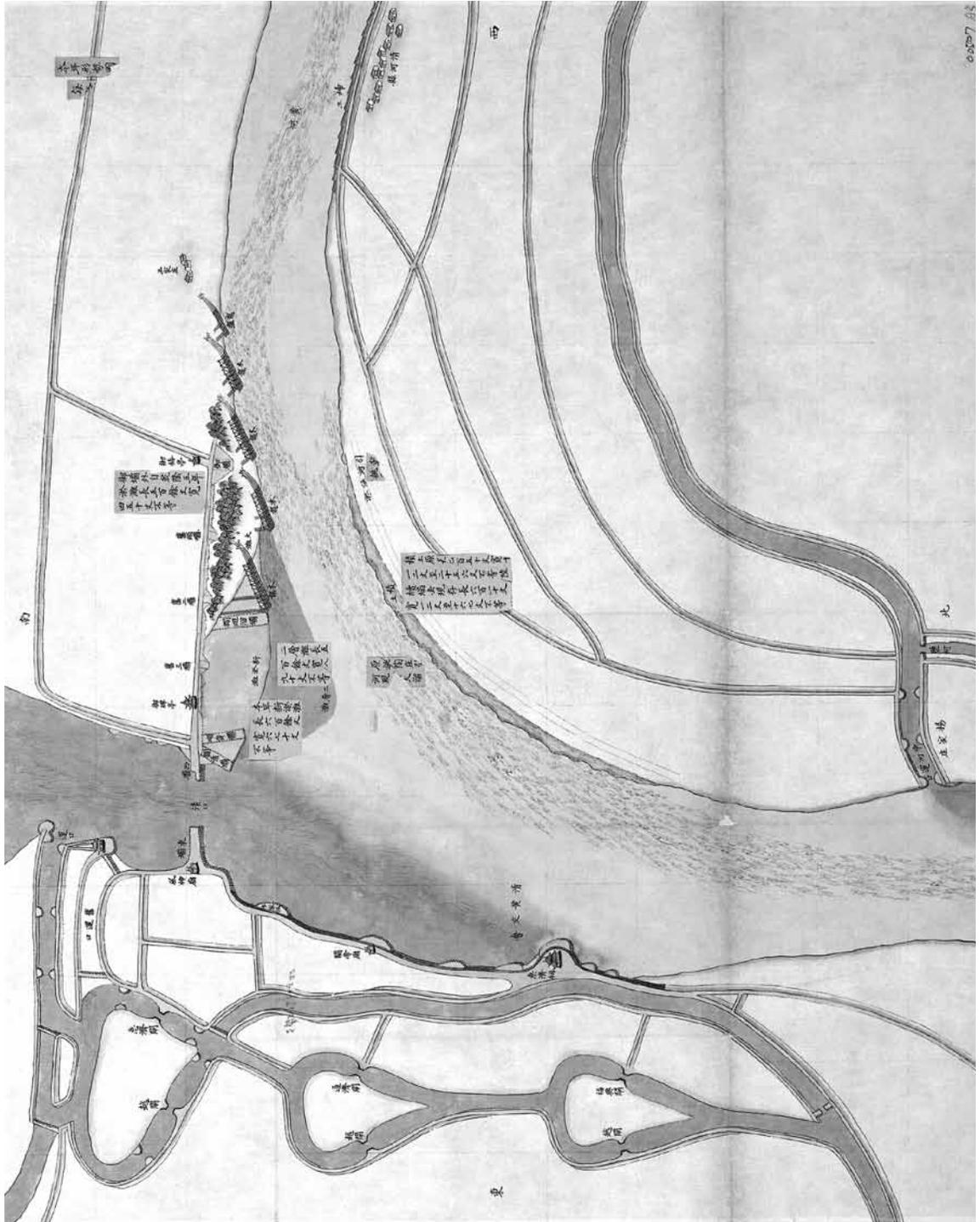


圖 3 〈乾隆十四年黃河清河木龍圖〉，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文獻編號：00502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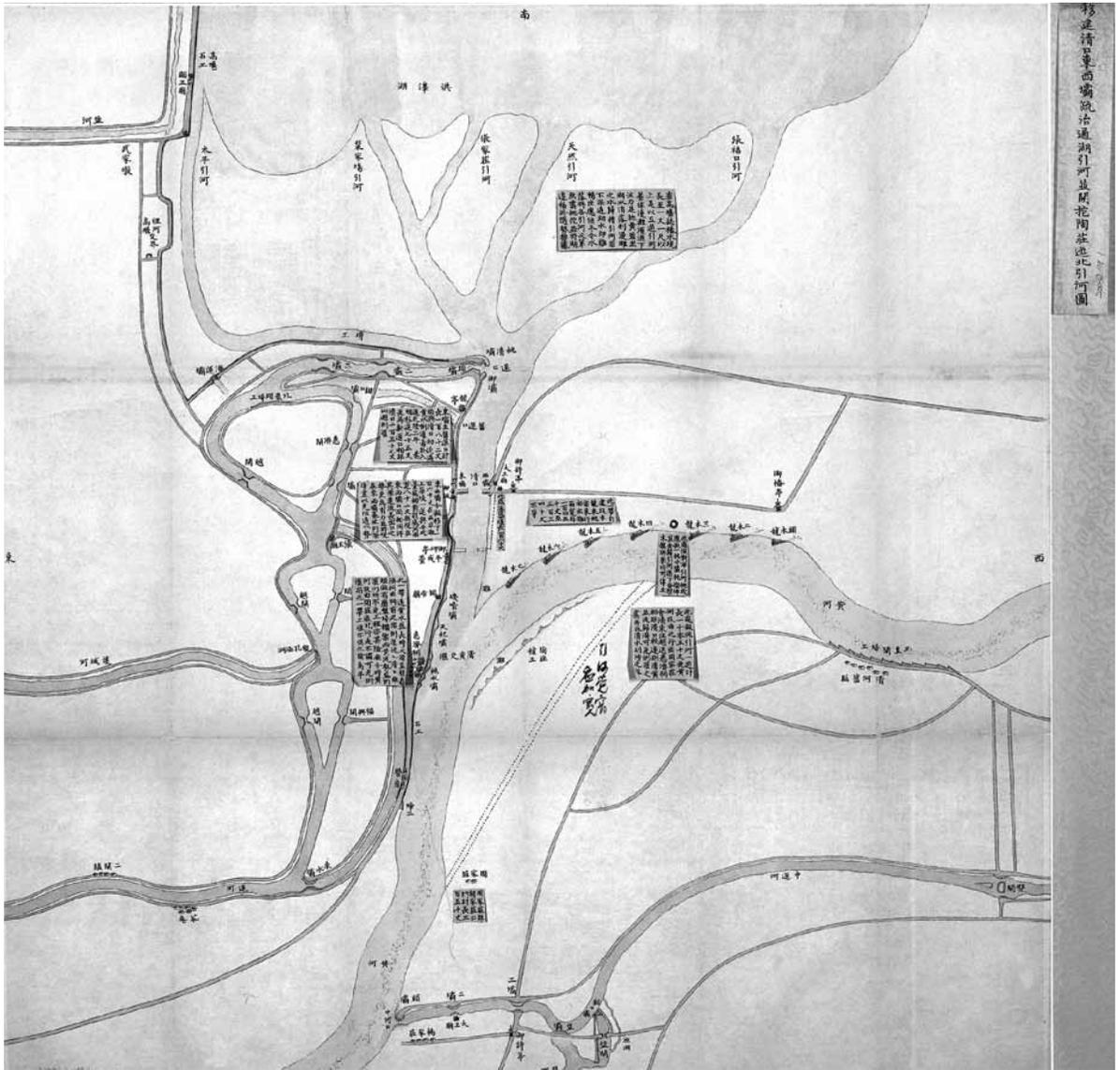


圖4 〈移建清口東西壩疏治通湖引河並開挖陶莊迤北引河圖〉，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文獻編號：02003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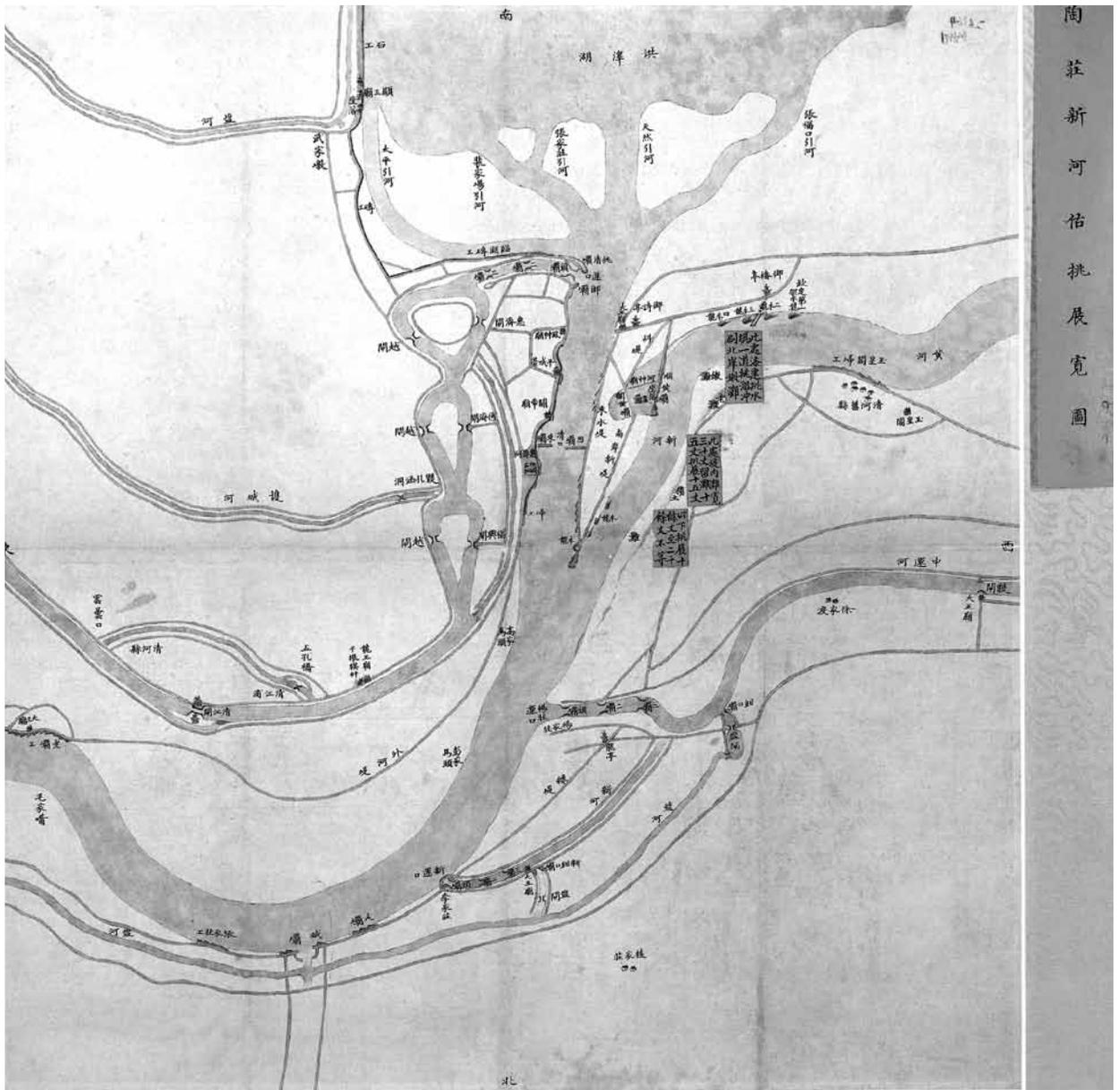


圖7 《陶莊新河估挑展寬圖》，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文獻編號：02636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陶莊新河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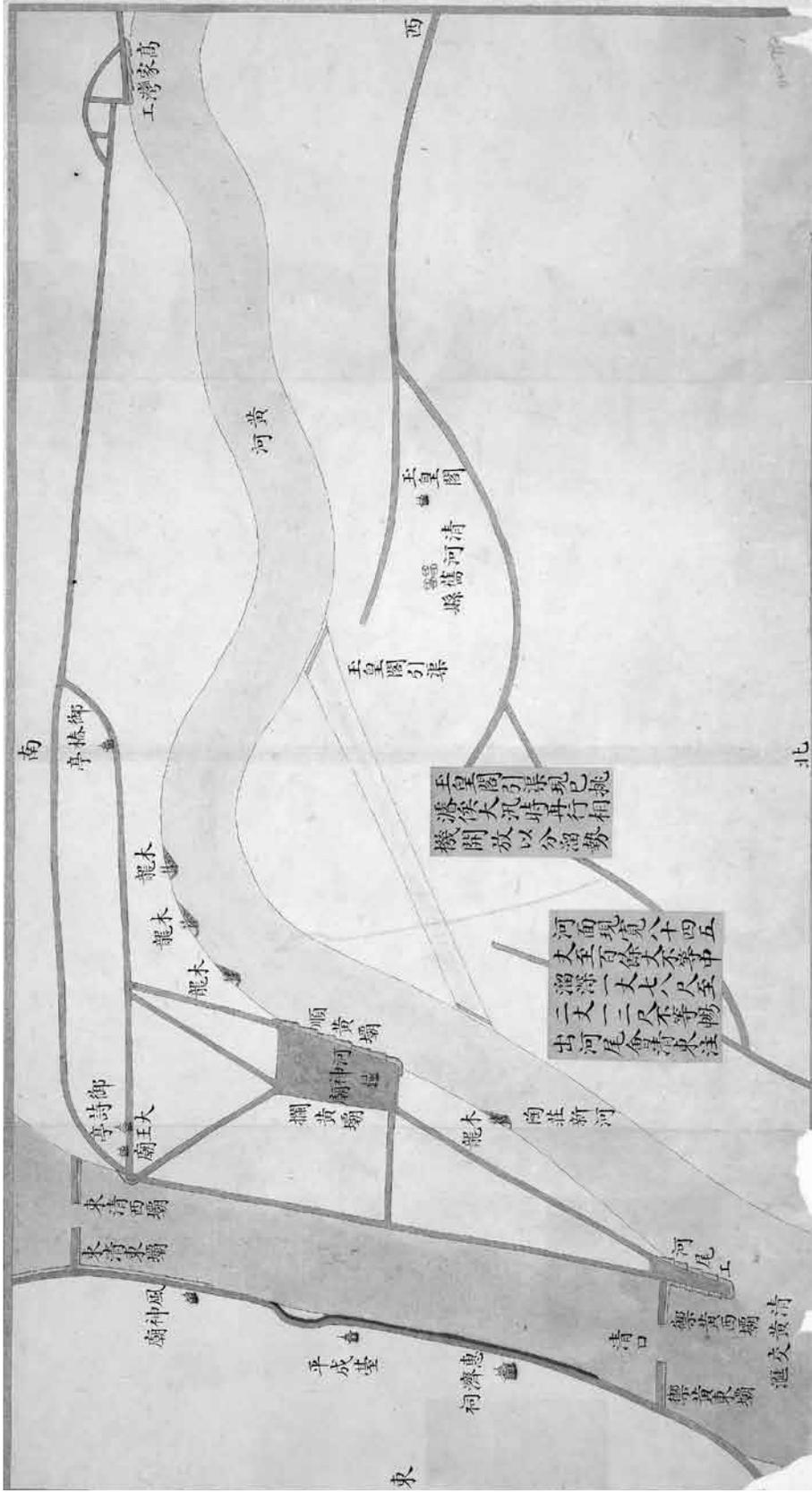


圖 8 〈陶莊新河形勢圖〉，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文獻編號：04079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河廳屬開放沈家窩引河溜勢通暢情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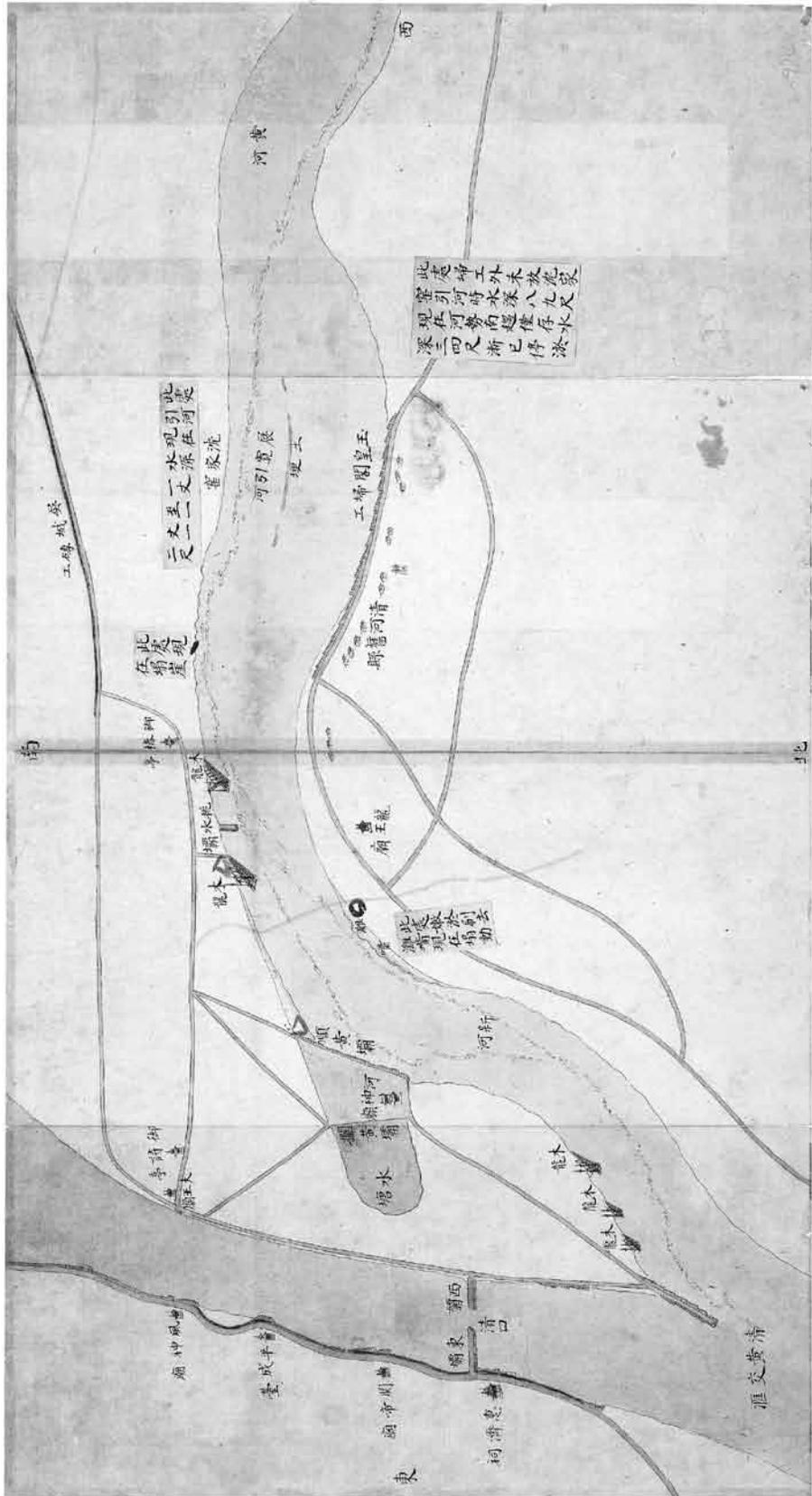


圖 9 〈外河廳屬開放沈家窩引河溜勢通暢情形圖〉，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文獻編號：03098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